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宗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泽霖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高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全球经济持续恶化 土地确权是房价下跌诱因

经济危机没有过去 仅是步入新的阶段

“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虽然从去年开始,很多国内外的专家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并且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国外的政治家是因为选民的需要,会不断地强调经济形势不错。但我们不能如此乐观,人云亦云。必须对经济危机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我们认为危机确实是在好转,但是并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扬认为经济危机进入新阶段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个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扭曲。发展方式的扭曲问题表现为过度的依赖消费,对比中国是过度的依赖投资和出口。在收入的范围内消费还无可厚非,但发达经济体已经超出了收入的能力进行消费,于是就要借债。

这次危机是债务危机,这个债务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是人们的过度消费。企业、居民、政府都过度消费,都预支了自己的未来。发达经济体由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得过度消费对全球都产生了影响。所以才会因为美元出现问题,我国的储备就出现了问题。

以上是发展方式问题,它的经济结构是高端服务业,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之中,发达经济体用他们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产品和服务和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来交换实体产品。但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我国也需要发展高端制造业,也需要发展高端服务业。当我们有这种诉求,并取得一定的进展之后,一定会对发达经济体产生冲击。所以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要制造业重新回归,这也印证了危机还没有过去。

第二个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财政问题。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借债过多,但在解救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需要政府的支出,支出没有税收支持,就需要借债。导致危机的因素这几年已经恶化了,怎么能说危机过去了呢?

第三个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问题。过度的杠杆化,用少量的钱支付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过度的杠杆化和延伸化是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过度的杠杆化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再一次证明危机没有过去。

因此总体而言,这些都表明了危机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并没有过去。2007年的经济危机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危机在不断地深化;第二个阶段是危机停止,开始调整;第三个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逐渐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都经历过了,危机才算过去,现在仅是第二个阶段刚刚开始。

对于每个阶段的特征,李扬解释到:第一个阶段是货币不断地量化宽松;第二个阶段是逐渐减少了刺激力度,逐渐恢复正常;第三个阶段是把第一阶段放出去的货币收回。



编者按:

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到底有没有过去?如果没有过去现在正处于哪个阶段?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会产生哪些影响?我国在这场危机之中是否有崛起的可能?针对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孙梦姝近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他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本报转发此文,以期期待能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改革开放带来储蓄和人口红利 经济危机促使中国崛起

在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发达经济体的变化不大,但变化最大的是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需要美国资金的流入来发展经济,但中国并不需要。在全球化经济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有变化,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现在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我国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形势似乎有一些好转,但欧洲的形势却在进一步恶化。债务问题、经济增长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等都在恶化。还有日本,安倍上台之后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都是短期的刺激,日本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短期的刺激政策如果效果好可以为日本解决结构问题创造条件,但现在看

起来,效果并不好。日本20年的经济停滞,它的特殊问题在于国土太小、对外依赖度高、老龄化严重、金融机构的问题还有小国寡民的心态,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能够解决,所以日本的情况也不乐观。

因此发达经济体除了美国有所好转之外,其他国家都在恶化,而新兴经济体也开始逐步恶化。也说明了危机还在第二个阶段,会长期的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并会持续很长时间。

中国经济从1978年进行改革,在很长时间里经历了高增长,那个时候我国的国际背景是一路向上的。但我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之中也没能幸免,只能说我国有特殊的地方也有与其他国家表现相同的地方。特殊的地方在于,我国于1978年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一个瓶颈问题,就是储蓄不够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困境,靠外资是万万不可的,必须从内部解决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中国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储蓄率提高,然后储蓄率通过金融机构变成了投资,投资就是增长,必须有这样一个关键点的突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突破了这个问题,从统计上看我国在1994年,储蓄已经增长得十分迅速了,直到2013年我国的储蓄率为51%,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过去会说我国经济的发展依赖投资是不可持续的,但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是可以持续的。只要国内有储蓄,就能有投资。我国的投资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有更高额的储蓄在支撑。因此在这次危机中可以应付自如,并可以在未来获益良多的只有中国。

另外,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有储蓄,还有

人口红利。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代表了就业的人多,实质而言是产生了一个良性的封闭环,即人口多——需要就业——需要投资——需要储蓄——人口多。

人口如何从负担变成了红利,背后依靠的是体制变化。不管未来的形式发展如何,仅目前来看,中国是一个大赢家,对于我国而言,现在的机遇是千载难逢的时机。

经济危机显露五大问题 改革是解决的唯一途径

以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但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也无法脱离这个环境独善其身。再加上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问题,会出现以下5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如果说下降的是水分,从10%的增长下降到7.5%的增长是通过挤水分挤出来的,即7.5%都是干货,那么即使增长速度在下降,也是良性的。因此经济增长没有上限是3.5的通货膨胀、下限是4.6的失业率。不超出这个水平就不采取措施,加紧进行结构调整,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它的净效果是挤出了水分,留下的是有效率、有质量的GDP。

人口的投入增长率下降,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也在下降,如果科技进步可以顶上来,也能保持平衡。但科技进步一般都是很慢的,因此前两个方面的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可以说成是结构性减速,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的事情是不可挽回的,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让经济增速,如果有过快的增速,那就是泡沫。

第二个问题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与我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有关,因为我国的消费水平是平稳的,在短期内让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从研究上看,这几年的消费率实际上在下降。多年来我国靠的是出口提升增长率,现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不可能让出口有较大的变化,所以还要靠投资。但投资过多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宏观平衡是刀刃上的平衡,稍有偏颇,就会出现要增长就要投资,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也就是说不能投资,但是不能投资到产能过剩的领域了,于是就要有新的产业,但新兴产业也不容易寻找。因此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转变那种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调整过剩的产能。

第三个问题是房地产的问题。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们的心中之痛,总的来说就是不知道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到底是多还是少?如果按销售数据来讲,人均占有40平方米,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房子。因此房地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心中无数,不知道房屋的供求关系如何?肯定是有人没有房子,但什么人没有房子?因为什么没有房子?与这群人相对应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下岗

工人没有房子、大学生没有房子,那与之相对应的就不能是别墅,甚至不能是一般的商品房,应该是过渡性的廉租房。再有第二个问题是住房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问题,例如北京和周边县城的住房问题不能放在同一个供求关系上考虑。目前二线以下的城市基本上是供求平衡或者说是供应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同一种政策的。

有两个方法会让这个事情水落石出:第一个是今年6月份的网络房产实名登记,可以解决心中无数的问题。第二个是城镇化的方略有了变化。在三中全会之前,很多对房地产表示乐观的人是寄望于城镇化发展的。三中全会之后对城镇化是一个全新的表述:第一个是确定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第二个是土地权利的使用问题。第三个权利是可以交易的。第四个问题才是城镇化的问题。其实城镇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的问题,而土地问题的主动权在农民手里,农民再也不能忍受地方政府低价收购其土地,在高价售出这样一种不合理的交易结构。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城镇化就基本停止了。因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鬼城,城镇化变成了房地产化,而房地产又没有产业的支撑。如果土地的确权进行了调整,会发现农民不愿意到城里来了,以后的情况是大部分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地,其他的时间到城里打工。今年春节过后的“民工荒”正是显示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现象,这个体制的变化会对房地产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个问题是金融领域乱象的问题。金融乱象指的就是货币泛滥,利率高悬,贷款难、贷款贵。之所以说是乱象,用我国与美国比较一下,美国虽热货币泛滥,但是其利率较低,是0—0.25%,并长期保持。货币多了,利率理应低一些才对。但在我国却是钱多,利率也多,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现象。

第五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国的总量没有问题,但结构上有问题,部分地区、部分领域会比较严重,而且中国政府地方债务问题又与地方财政有关,又与比较偏颇的城镇化有关。地方政府都是靠土地来还债的,在这个新的城乡一体化中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金融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

全球经济在2007年进入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危机,这个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发达国家,他们滥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利,用货币无偿的占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无论原因归谁,调整的责任是全世界共担的。在这个意义上,全世界都必须改革,也就是谁对自己的危机认识的深刻,谁采取的措施最有针对性,而且比较全面,谁下的决心最大,谁行动最快,谁在未来就是世界领先的,而中国恰是其中的佼佼者。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深化制度改革,中国必将崛起。

(据新华房产2月17日北京讯)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挑战

■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普遍看法已变得愈发乐观,原因显而易见。高收入经济体似乎终于开始复苏,美英两国尤为如此。但前路仍然坎坷,特别是欧元区。对新兴国家而言,高收入国家增长势头转强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说欢喜之情是威胁稳定的因素之一,那么它在2014年应该不会太常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奠定了今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达沃斯年会的基调。IMF将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率微调上调至3.7%(仅比201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的数字高0.1个百分点)。但IMF将英国的预计增长率上调了0.6个百分点,将日本和西班牙的这个数字各上调了0.4个百分点,将德国和美国的这个数字各上调了0.2个百分点。

然而,高收入国家的预计增长率依然偏低:美国为2.8%,英国为2.4%,日本为1.7%,欧元区为1%。如果该预测准确的话,这些经济体将无法缩小经济产出增长率相对于危机前趋势增长率的差距:欧元区这一缺口为约13%,美国为15%,英国为18%。尽管推出了超宽松货币政策,高收入经济体从毁灭性衰退中的复苏速度依然缓慢。尽管令人沮丧,但现实依然如此。

最终结果有没有可能好于IMF预期?有

可能,而经济增长率最有可能超越IMF预期的是美国,因为美国能源成本低,财政紧缩已放缓,金融业健康(至少与过去相比),家庭负债较峰值水平已有大幅回落,并且房价正在上涨。根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学者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从重大金融危机中恢复需要7年时间。如果真是如此,美国增长加速的时刻可能已经到来。

欧元区前景黯淡:继2012年衰退0.7%、2013年衰退0.4%之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将为1%。西班牙和意大利今年的预计增长率只有0.6%。市场信心强势反弹,可能使欧洲的复苏好于预期。糟糕的是,欧元区还面临一些明显的下行风险。一是预期通胀率可能降至极低水平,甚至进入通缩区间。高负债经济体的物价不断下跌,将让债务压力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并由此带来进一步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二是即将对欧洲银行进行评估,可能会暴露出许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如果通过实施内部纾困、让债权人承担损失来满足要求,银行融资可能将进一步被扰乱,对较为脆弱的经济体而言尤为如此。

总体来看,新兴经济体今年的预期增长率仍为5.1%,高于2013年的4.7%。像往常一样,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预计将领跑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国今年预期将实现7.5%的增长率。

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千差万

别。但全球的重大动向会影响所有经济体,只是方式可能不尽相同。去年初夏,美国释放出拟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引发了一阵“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如今美联储(Fed)已经开始缩减资产购买,上述现象卷土重来。此类市场变化并非预示着金融危机将会大面积爆发。阿根廷现在情况很糟,但这并未出乎大多数观察人士的预料,因为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均十分庞大的国家必然脆弱。一些地方的企业负债也出现高企。但如果哪个国家爆发危机,那应该是由该国特有的弱点导致。大面积爆发危机应该是不可能的。

然而,即便没有爆发危机,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加上各国自身的弱点,仍有可能导致不少经济体增长放缓。在近期的一篇博客中,IMF副总裁朱民列出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四大不利变化: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中国增长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际贸易疲软。我还想加上一点:欧元区的调整——经常账户大幅转向盈余,世界其他地区则与之正好相反。上述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净资本流入,将使得新兴经济体难以承受资本流入“急刹车”的后果。

朱民还指出,在过去50年内,新兴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增速并不高于高收入国家。相反,尽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速确实快于高收入国家,但到八九十年代,新兴国家又落后了。到了21世纪初,新兴国家才再次领先。令人失



望的是,拉美50年来未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convergence),如今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反而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有人担心,未来新兴国家可能出现一段较长的表现相对疲软的时期。维持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这绝非易事。

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2008年以来,中国的增长日益依赖信贷的剧增。这种做法是无法持续的,而在一个经济增速仅为历史水平3/4的国家,将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投资,也是不明智的。中国政府可能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眼下承受一场比原计划更严重的经济增长放缓;要么推迟改革,这样

的话经济增长在日后将遭受严重得多的冲击。

那么应当何去何从?答案是:促进复苏、推行改革。对于美国,这意味着在提高债务上限的辩论中摒弃那些愚蠢言论。对于欧元区,这意味着坚定地扩大需求和提高通胀率(至少提高到2%)。对于日本而言也同样如此,只是日本央行似乎更有决心达成既定目标。对于新兴国家,这意味着另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中国、巴西和印度。此外,避免诸如中日冲突这样的地缘政治灾难也至关重要。合作和交流应成为未来的主打牌。

眼下我们走出危机时代的希望确实大于以往。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转自 FT 中文网)